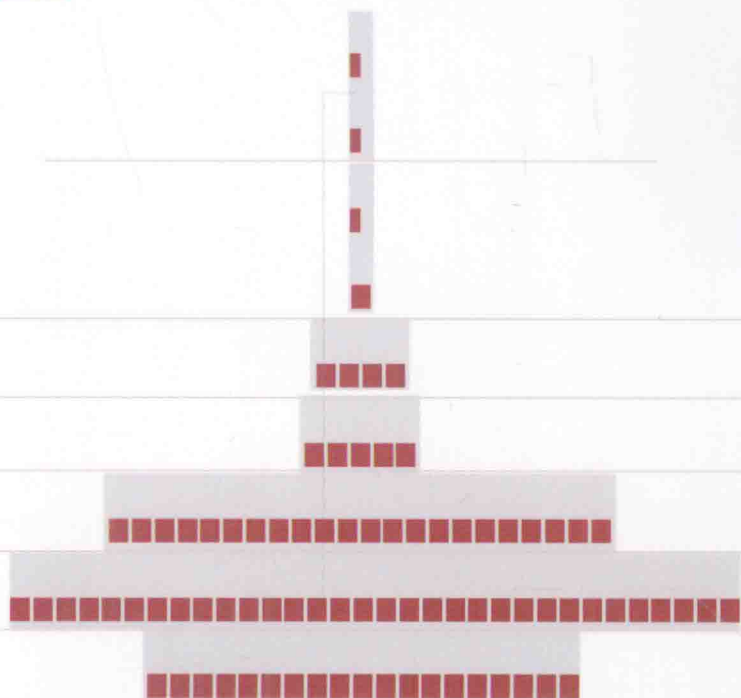


小康县域研究系列丛书

南江社会的 分层与反制

NANJIANG SHEHUI DE
FENCENG YU FANZHI

◎ 张网成 著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www.bjup.com.cn>

小康县域研究系列丛书

南江社会的分层与反制

张网成 著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县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 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

作为第一部全面分析我国县域社会分层的实证研究报告, 从收入、职业、教育、城乡、自我认知等多个维度呈现了“南江”(长江中下游的一个县级市)社会阶层分化结构的面貌、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 分析了南江社会的阶层分化原因、阶层归属要素、阶层分化程度以及与阶层分化相关的社会问题, 检视了现有社会政策的反制效果, 并在总结社会底层民众面临的主要困境和改革愿望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书对各级政府了解治域内的分层结构和社会矛盾及制定相应的调节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为一部学术著作, 本书也适合关注农村社会发展与社会问题的官员、学者、媒体人及相关专业的高校学生等阅读。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江社会的分层与反制 / 张网等著. —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121-2234-5

I. ①南… II. ①张… III. ①社会结构-研究-南江县-现代 ②社会政策-研究-南江县-现代 IV. ①D67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7069 号

责任编辑: 陈跃琴

出版发行: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电话: 010-51686414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44 号

邮编: 100044

印刷者: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235 印张: 14.5 字数: 251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1-2234-5/D·180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向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质监组反映。对您的意见和批评, 我们表示欢迎和感谢。
投诉电话: 010-51686043, 51686008; 传真: 010-62225406; E-mail: press@bjtu.edu.cn。

目 录

序言	1
一、背景与问题	1
二、研究现状与不足	5
三、研究定位和选点	10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13
五、问卷与抽样调查	14
六、章节安排	16
第一章 理论回顾与分析框架	17
一、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理论	17
(一) 十大阶层论	18
(二) “七阶层说”	19
(三) 社会断裂论	21
(四) 倒丁字型社会结构理论	23
(五) 四个利益集团理论	24
(六) 阶层关系双重再生产理论	26
(七) 阶层认知相对剥夺论	28
二、关于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	29
(一) 中产阶级的特征	30
(二) 中产阶级的构成与规模	31
(三) 中产阶级的社会与政治功能	35
三、关于社会流动	37
(一) 功能及合理性标准	38
(二) 基本规则与制度干扰	39
(三) 社会阶层固化	40
四、社会政策与社会分层关系研究	42

(一) 社会分层与福利国家	42
(二) 我国现行保障制度及其调节功能	50
(三) 目前阶层分化问题与政策建议	59
第二章 阶层分化：个体维度	62
一、个人收入与社会分层	62
(一) 人均收入推算	64
(二) 五等分方法	65
(三) 收入的人口分层形态	67
(四) 个人收入变化	72
二、教育与社会分层	75
(一) 学历分层标准	76
(二) 学历分层结构	78
三、职业与社会分层	80
(一) 基本情况	82
(二) 五类职业分层	84
(三) 职业代际流动	87
四、南江的中产阶级	88
五、主观收入分层	91
(一) 收入分层认同	91
(二) 影响主观收入分层的因素分析	92
第三章 阶层分化：家庭维度	97
一、家庭收入与社会分层	98
(一) 家庭人均收入估算	100
(二) 五等分法	100
(三) 家庭收入的人口分层形态	103
二、家庭消费与社会分层	104
(一) 基本情况	105
(二) 五等分法	106
(三) 家庭支出分层形态	107
(四) 耐用消费品与社会分层	108

三、教育与社会分层	112
(一) 学历与家庭社会分层	113
(二) 学历与低收入	114
(三) 学历与消费贫困	115
四、南江的中产家庭	116
五、家庭收入主观分层	117
(一) 家庭收入分层认同	117
(二) 影响家庭收入主观分层的因素分析	119
六、家庭社会地位分层	122
(一) 家庭社会地位分层自评	122
(二) 家庭社会地位变化	123
(三) 影响家庭社会地位自评的因素分析	126
第四章 阶层分化与阶层意识	130
一、社会阶层与阶层意识	130
二、社会阶层分化原因	134
(一) 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因素	135
(二) 年龄与社会分层原因	139
(三) 信仰与阶层分化原因	140
(四) 学历与社会分层原因	141
(五) 收入与阶层分化原因	143
(六) 社区干部与阶层分化原因	144
三、阶层归属的影响因素	145
(一) 阶层归属要素	145
(二) 年龄与阶层归属影响要素	148
(三) 学历与阶层归属影响要素	149
(四) 收入与阶层归属影响要素	150
(五) 信仰与阶层归属影响要素	151
四、阶层分化的程度	153
(一) 总的情况	153
(二) 年龄段与阶层分化程度	154

(三) 学历与阶层分化程度	154
(四) 信仰与阶层分化程度	155
(五) 个人收入与阶层分化程度	155
(六) 社区干部与阶层分化程度	156
五、阶层分化的严重程度	157
(一) 总的情况	157
(二) 年龄段与阶层分化严重程度	158
(三) 信仰与阶层分化严重程度	158
(四) 学历与阶层分化严重程度	159
(五) 个人收入与阶层分化严重程度	159
(六) 社区干部与阶层分化严重程度	160
(七) 收入差距容忍度	161
六、阶层意识与社会意识	163
第五章 阶层分化：问题与反制	165
一、阶层分化引起的社会问题	165
(一) 总的情况	166
(二) 年龄段与社会问题	167
(三) 学历与阶层分化问题	168
(四) 信仰与阶层分化问题	169
(五) 收入与阶层分化问题	170
(六) 职业与阶层分化问题	171
(七) 社区干部与阶层分化问题	172
二、最不能容忍的社会现象	173
(一) 最反感的社會现象	173
(二) 学历与最反感的社會现象	175
(三) 收入与最反感的社會现象	176
(四) 职业与最反感的社會现象	177
三、最底层居民的改革愿望	179
(一) 基本情况	179
(二) 学历与最底层民众改革愿望	180

(三) 职业与最底层民众改革愿望·····	181
(四) 家庭收入与底层民众改革愿望·····	183
(五) 社区干部与底层民众改革愿望·····	183
四、社会政策的反制效果·····	184
(一) 医疗保险·····	185
(二) 养老保险·····	188
(三) 社会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线·····	191
五、阶层关系调节与社会政策改进·····	195
第六章 结论与反思 ·····	201
一、关于社会分层结构·····	201
二、关于社会流动·····	202
三、关于阶层意识·····	203
四、关于阶层关系调节政策·····	205
五、困境与出路·····	206
(一) 社会政策如何改进·····	206
(二) 工会制度如何改革·····	209
(三) 第三部门如何释放活力·····	210
六、研究的不足·····	212
参考文献 ·····	213
鸣谢 ·····	224

序 言

一、背景与问题

自秦朝设郡县以来，县长期以来都是我国一级行政区划。县域就是以县为行政区划的地理-经济-社会空间。除了有较为明显的自然地理边界、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和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之外，当今的县域一般还拥有相当完善的行政管理系统。与中央政府相比，除了国家层面的军事、外交职能外，其他的职能县级政府几乎都有。截止到 2013 年年底，中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包括市辖区 872 个）共 2 853 个，而不包括市辖区的真正意义上的县级行政区划单位数为 1 993 个。^① 2011 年，全国县域总面积占国土面积 90% 以上，人口 8.85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65.72%。^② 县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于整个中国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县域发展状况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决定着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决定着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前途。”^③

但长期以来，我国县域行政系统一直是上级政府推行工业-城市偏向政策的“得力助手”。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种二元政策（包括限制生产性要素的自由流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④、限制农民分享城市化成果等），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城乡二

① 民政部《2013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406/20140600654488.shtml.

② 刘福刚：《县域统筹与统筹县域：中国县域经济十年发展报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

③ 回良玉在学习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县委书记培训班上的讲话，刊于《人民日报》（2008 年 11 月 11 日 02 版）：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08-11/11/content_136689.htm。

④ 据测算，1951 年至 1978 年间，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国家从农民手里拿走了 5 100 亿元，1978 年至 1986 年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业剩余中年均剪去 700 亿元，1987 年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前期每年剪去上千亿元。参见：巴志鹏：《建国后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差筹集了多少资金》，《临沂大学学报》，2005（2）。

元经济社会结构, 县域(通常也称为农村地区)在为城市贡献了巨量的资金、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同时, 却很少得到来自城市的回馈, 城乡之间的各种差异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 县域发展的自主性和能力都得到了加强, 但城乡二元结构给县域发展带来的制约格局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2011年,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高达3.13:1, 远高于1978年的2.37:1, 已经为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如果把城乡居民收入中一些非货币因素(如住房、教育^①、医疗^②、养老、就业等各种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设施)考虑在内,^③ 城乡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实际达到6:1;^④ 同年, 县域地区生产总值达24.14万亿元, 占全国GDP的51.04%, 远低于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 县域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仅有1.32万亿元, 占全国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25.07%; 全国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7590元, 为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78.43%, 其中, 五分之四的县域低于全国平均, 三分之二的县域低于全国平均的四分之三; 县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悬殊,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100个县域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值是最低100个县域的17.55倍。^⑤

“县这一级, 相对于全国来说, 处于宏观之尾。而相对于县内若干个乡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来说, 它又处于微观之首。”^⑥ 县域行政在国家治理中属基础环节, 因此, 自古就有“郡县治, 天下安”的说法。但目前, 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社会结构新旧交融及行政治理能力不足等有关,

① 杨东平教授在《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2006, 北京大学出版社)提供的一组2003年前后的数据最能反映我国城乡教育的差距: 非农业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的比例明显高于农业人口, 其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业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② 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韩凤透露的信息很能说明医疗保障水平的城乡差异: 在医保筹资额比例方面, 农民、城镇居民、企业职工和公务员的比例为1:2:10:20。转引自: 陈璇. 中国社保制度城乡差距大、影响全民分享发展成果. 中国青年报, 2012-3-1.

③ 长三角地区一个县级政府梳理的结果显示, 当地城乡居民间存在33项因政策不同而产生的“待遇差异”。参见叶锋撰写的《33项待遇差异折射城乡户籍鸿沟》: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4-06/27/c_133442609.htm.

④ 杨子健. 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 中国信息界, 2013(6).

⑤ 刘福刚. 县域统筹与统筹县域——中国县域经济十年发展报告.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2.

⑥ 习近平在第一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县委书记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2008年11月10日, <http://www.people.com.cn/GB/60833/72591/8328621.html>.

我国的县域治理深陷困局，县域层面的社会管理是我国整体社会管理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各类矛盾纠纷凸显，刑事案件高发。在学者朱力看来，县域社会中最突出的矛盾，在经济领域是失地、失业，在社会领域是贫富两极分化，在政治领域是腐败。与城市政府相比，县域层面的矛盾错综复杂，既有全国性的普遍的社会矛盾，又有地域性的、特殊的、具体的社会矛盾，县域层面的管理者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矛盾，要在实践层面解决具体问题，而诸多制度性的矛盾、政策性的矛盾，县域层面的管理者是无法解决的。在县域，公权力的行使与群众的直接利益密切相关，群众与政府的关系较近，对政府的关注度也相对较高，感受到的官民矛盾也更为强烈，因此，县域非常容易形成社会矛盾“结构箱”。^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单光肅在观察 21 世纪以来的群体事件中发现，县域成为群体事件易发地点，而暴力形式的事件多发生在中西部偏远的小县城。从诱发因素看，这些县域的社会结构具有两个特点：一是 1994 年税费改革后，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县级政府与居民形成直接面对面的社会关系结构，很多矛盾直接指向县级政府；二是全面推行市场化体制改革后，县级政府与企业 and 居民形成复杂的三元利益关系结构，由于地方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结盟牟利，政府公信力流失，利益冲突最终也会指向县级政府。从调控因素看，这些县级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都较弱。近年来，随着县级政府对基层治理和社会控制的不断加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空隙收窄，但底层社会结构性张力并未消减，微观环境里的结构性矛盾的淤积仍在继续，虽然表面上群体事件一度出现减少趋势（2008—2010 年），但是个体恶性事件却在增加。^② 2011 年起，群体事件重新增加，且出现了引人注目的东移态势，并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导致东部县域群体事件增多的原因有：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更敏感；目前面临的社会问题远较中西部地区尖锐；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的诸多领域“先行先试”，很多矛盾也率先积累爆发；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资源远较内地稀缺，争夺更甚；大量流动人口存在，社会管理问题多；中小企业融资难，产业转型升级难；国内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劳资关系趋紧。^③

① 朱力．社会“结构箱”中的县域矛盾治理．人民论坛：中旬刊，2012（10）．

② 单光肅．县域为何易发群体性事件．人民论坛，2011（12）：上．

③ 单光肅．保障合法，反对非法，制裁暴力——对近两年群体事件新变化的认识．南方周末，2013-5-2．

在比较大城市与县域群体性事件的差异时，单光鼐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价值的命题，即阶层的高度分化有助于增加争议行动中的理性成分。他解释说，大城市的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很少会升级为暴力冲突，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城市社会分化很厉害，尤其是阶层分化更为明显，利益多元化程度较高，同质性差，异质性强，组织和动员群体行动十分不易，因此，只有采取理性平和的集体行动才能取得预期效果；而（偏远的）县域的社会分化远不如大城市那样分明，草根阶层要想把人召集动员起来，就需要依靠熟人社会，依靠事先存在的人际关系网络，而基于人际关系网络的集体情感一旦在集体行动中被唤醒，群众的挑战、违抗和不服从往往表现为情绪冲动、宣泄和抒发，事件就很有可能朝着暴力化方向演进。^①

县域居住着三分之二的同胞，县域社会矛盾多发，且不时以暴力事件的形式表达出来，县域发展之于城乡一体化、国家全面现代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性意义，这一切足以使我们对县域社会的社会分化和阶层结构充满兴趣。原来由“两个阶级两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领导干部阶层）^②构成的县域社会结构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是否呈现出某种变化趋势？不同县域社会的阶层分化程度和特征是否存在显著差别？造成县域社会阶层分化的机制有哪些？与城市社会分化机制有何区别？县域阶层分化有哪些正面及负面的后果，又对县域治理和民主化进程有着怎样的影响？县域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是否已经明晰化？阶层之间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的差别是否已经初步形成？阶层之间的边界是隐约可见还是固若金汤？阶层之间的心理隔阂是否正在逐步加深？县域社会矛盾多发，是因为阶层之间的利益博弈和利益冲突日益尖锐，还是因为民众与政府之间日益对立？

① 单光鼐，蒋兆勇．县级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及矛盾对立．领导者，2012（29）．

② 一般认为，1956—1978年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的结构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据陆学艺的考证，这一提法来源于斯大林（参见：陆学艺．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论的剖析．江苏社会科学，2004（4））。但笔者认为，这一提法并不能完整地概括当时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因为任何社会的秩序结构中都不可能仅有治理者（阶层）或被治理者（阶层），因此，更合适的提法是“两个阶级两个阶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各种秩序混乱正是由于人们意欲模糊甚至颠倒治与被治的基本社会结构的冲动和尝试。“两个阶级两个阶层”是从阶级的角度分类的，从职业结构的角度看，计划经济时期的县域社会阶层至少还要包括社队企业工人，至改革开放前夕，他们在数量上超过知识阶层和社队管理阶层。

社会底层抱怨社会不公、民粹主义抬头与阶层分化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① 县域社会流动情况如何,以及出现了哪些障碍?县域的权力滥用现象是否普遍?权力实践对社会阶层分化产生了怎样的(扭曲性的)影响?既得利益集团是否形成,其垄断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又如何?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制约之下,县域社会的阶层分化和阶层结构表现出怎样的(区别于城市阶层分化的)特殊性质?政策以及什么样的政策能够调节阶层分化?政府近年来推行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新农村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规划和统筹发展又对县域社会的阶层分化和阶层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显然,这些问题涉及面过于宽广,作者并不奢望在一项实证研究中均有所涉及,而是将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县域阶层分化的现状及问题,二是县域社会主体对阶层分化及其问题的理解和评判,三是阶层分化调节政策的成效与不足。

二、研究现状与不足

社会阶层是社会学的经典命题之一,关于社会阶层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我国学者对这个命题的重新关注,大致始于20世纪90年代。期间,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既有理论方面的,也有实证方面的。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要么偏重于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要么偏重于农村社会分层研究,而很少以县域社会为研究对象。随着“省管县”改革的不断推进,县域将承担更多的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法制建设和政治民主化功能,县域政府的挑战和压力也将随之增加。在此背景下,预期对县域社会的研究将会得到加强。就研究技术而言,多维度的分层研究对于收集县域社会的职业结构、收入分配、社会生活、人才储备、城乡融合、劳资关系、社会矛盾、官民关系、制度缺失、政策效果等各种基础数据,揭示县域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是非常适用的。没有这些基础数据,县域政府很难制定切合实际的规划和政策。这也是我们开展本项研究的动机之一。

至今为止,关于我国当代县域社会分层的实证研究,值得一提的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下文简称“陆学艺课题组”)及其相关成员开展的。该课题组曾在世纪之交,利用三年时间先后对湖北省汉川

^① 黄裕. 消解“阶层固化”隐忧. 瞭望, 2011(2).

市、辽宁省海城市、福建省福清市、贵州省镇宁县、安徽省合肥市、江苏省无锡市和吴江市7市县，广东省深圳市、北京燕山石化总厂、吉林省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天津南开大学等市、县、厂、校，进行了抽样问卷、入户访谈、座谈会和调研会等形式的调研，取得了11 000多个样本和近千份各类成员的访谈记录，并就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性质给出了两个论断：一是中国城市的社会经济等级结构正在向橄榄型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演变；二是乡村地区或城乡结合的县级行政区的社会阶层结构要转变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则还要走很漫长的路。^①

第一个论断一经提出，立即引发了学界的广泛争论。争论围绕着两个核心问题展开：一是我国城市社会阶层结构是否真的呈现为橄榄型结构？二是我国城市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是否真的朝向橄榄型结构演变？围绕着第一个核心问题，肯定论者主要采用了职业结构的分层标准，认为确实存在一个客观的、建立在劳动分工和职业分层的“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②而否定论者则使用了以基尼系数等衡量的收入两极分化等分层标准。围绕着第二个核心问题，肯定论者所依据的除了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外，还有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有机体理论及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而否定论者则提出了社会断裂理论、四个利益集团理论和阶层关系双重再生产理论等。事实上，陆学艺课题组对于第一个论断并非没有心存疑虑，他们也发现了职业分层结构与收入分层结构的不一致，在研究报告中，他们写道：从职业分层的视角看，深圳市的职业阶层结构要较合肥市的更接近橄榄形状，而从收入分层的视角看，则合肥市的收入分层结构较深圳市的更接近橄榄形状。^③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深究这种结构差异的成因，从而错失了一个建立本土化阶层分层结构的理论机遇。

关于第二个论断，学术界至今未有认真的回应。这一点本身就令人深思。县域社会阶层结构离城市（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很远，究竟是说县域与城市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异质异形，即分属于不同的社会结构类型，但前者迟早要向后者转型？还是说二者是同质异形，即二者同属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只不过前者在演进的道路上还刚刚起步？对此，陆学艺课题组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但却给出了迥异的暗示。从课题组出版的研究报告看，课题组是在比较了以深圳市（特区）

①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6。

②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6。

③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5。

与合肥市（辖区）为代表的城市社会阶层结构与以汉川市（中等发达县）与镇宁县（国家级贫困县）为代表的县域社会阶层结构之后，得出第二个论断的。^①由于课题组在分析城市和县域社会阶层结构时都采用了职业结构标准，在其研究的西部落后县域中同样发现了“十大阶层”的存在，^②据此可以推断城市与县域社会阶层结构之间的差异是量性的，而非质性的，二者是同质异形的关系。不过，吴江市也是陆学艺课题组的调查地之一，而且调查发生时其三次产业产值比例（8.3：54.4：37.3）应该介乎深圳市（1.1：52.5：46.4）和合肥市（11.1：47.7：41.2）之间，^③因此，如果按照就业结构标准分析，县域吴江市的社会阶层结构也应该属于（较）现代的社会阶层结构；^④但这样一来，第二个论断就站不住脚了。反过来，如果第二个推论也适用吴江市，那就意味着县域与城市的社会阶层结构就是异质同形的。此处的“同形”是从职业结构的角度来看的，比较容易理解，但判断二者是“异质”的标准又是什么？对此，陆学艺课题组并无解释。事实上，也可能无法解释。这大概是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三部分“市县个案研究报告”中没有出现“吴江市”的原因。

与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同年出版的还有关于汉川市和福清市个案研究的扩展单行本。^⑤其中，汉川市的研究报告主要是对汉川社会的各职业阶层进行了描述，关于汉川社会阶层结构的判断符合第二个论断；福

① 合肥市的案例还提示我们需要思考一个方法论问题，即当我们比较不同社会的阶层结构及分层形态时，对这些“社会”的同质性应该有怎样的要求？对任何人群或组织都可以开展社会阶层分析，因为它们都是“社会的”，但它们不是“社会”。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的成员的阶层属性是社会内部自制的，而一个“社会的”组织的成员的阶层属性则来源于组织的外部环境，而非组织内部自制的。

②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3-14。

③ 数据来源：《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深圳市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0年合肥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需要说明的是，陆学艺课题组调查的覆盖范围仅是合肥市的市辖区，而这里的三次产业比例则是整个合肥市的，因此与吴江市的数据存在不可比性。

④ 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的情况看，2000年合肥市辖区的纯粹或主要务农人员的比例为15.6%（陆学艺，2002：297）。2000年前后吴江市的就业结构数据，我们没有找到，但根据昆山市统计局的资料（《昆山非公有制经济保持强劲发展势头》，<http://www.szttj.gov.cn/news/2004/4/5/tjj/tjj-01-19-01-109.shtml>），我们大致可以推测，2000年吴江市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应该在20%左右，与合肥市接近，但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汉川市的情况（46.5%，陆学艺，2002：344）。

⑤ 胡顺延，胡功民：《中国中部地区社会结构变迁：汉川市社会阶层个案分析》，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关家麟，黄陵东：《中国东部地区社会结构变迁：福清市社会阶层个案分析》，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

清市的研究报告虽然指出了福清市社会结构已经告别了“金字塔”形态而呈现出“近似葫芦”形状，但是研究思路比较混乱，在社会阶层结构分析上存在一些有待商榷之处，如将10万出国打工者列为“高收入自由职业阶层”（对应五等级中的“中上层”，其实这些华人多为底层打工者，且一般不会再回国），将50万农村劳动力列为“小康农民阶层”（对应五等级中的“中下层”）等。可能正因为如此，福清市的个案并没有引起陆学艺课题组的重视，因而也未曾“威胁”到第二个论断。

陆学艺课题组提出两个基本论断的本意，（可能）是要借鉴现代化研究中的传统-现代二分法建立用于社会阶层结构分析的“理念型”，即呈“金字塔型”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呈“橄榄形”的现代社会结构。^①从研究方案的角度看，通过剥离城市中的农村部分，研究者可以得到“纯粹的”城市社会样本，这是非常巧妙的做法。不过，无论是哪个中国县域，其社会阶层结构在20世纪末都不再是典型意义上的传统社会结构，由此导致无法根据现实中的县域社会阶层结构来完成理念型的传统社会阶层结构的理论化。在这个意义上，陆学艺课题组对县域社会阶层结构的研究只是服务于（为研究城市社会分层）提供对比参照物。尽管陆学艺课题组提出的两个论断（至少在表述上）有很大问题，但这种社会结构的二分法还是可以有应用价值的。作为涉及我国当代县域社会阶层较早的一份研究，尽管比较粗糙，但陆学艺课题组采用的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分层视角也有应用价值。遗憾的是，由于未对合肥市的个案进行深入分析，使课题组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即中心-边缘依附理论视角。^②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各项政策的城市偏向（city bias）背景下，依附理论视角是解释县域社会阶层结构的有效工具。合肥市辖区集中了安徽省内和合肥市内“优质”的经济资源、权力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这使它在现代职业结构形成和收入分配过程中占有先机；但对合肥市的辖县和安徽省的其他市、县则是不公平的起始条件。

认识到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收入-财富分配上所起作用的本质是将差距扩大，“如果没有国家的介入，而坐等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自然形成，其问题可能

①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3-24。

② 并非没有人运用。事实上，李强区分“社会中心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的视角就是依附理论的，尽管他没有明确指出。参见：李强：《改革以来三十年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2008（5）。

会相当严重：有可能形成高度畸形的社会阶层结构”，^① 陆学艺课题组建议政府运用恰当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引导社会阶层结构朝合理方向演变，并提出了构建社会制度、社会政策新体系的五个原则：稳定为出发点、合作而非对抗为基调、共赢而非偏惠为成功基础、协调各阶层利益为首要目的、保护弱者是重要责任。鉴于陆学艺课题组研究成果在政府、学界和社会引起的巨大反响，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提议对 21 世纪我国社会政策体系建设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课题组而言，培育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就是培养庞大的中间阶层。由于他们的政策建议中始终未曾提到工会制度、非营利组织等，也未能直面户籍制度对于我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可以认为他们对西方国家经验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最近以县域为单位开展的实证研究是福建省委党校的程丽香 2008 年在福建省福清市和龙海市进行的。利用这些调查资料，她出版了一本有关县域中等收入阶层的专著，书中就县域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基本特征、收入差异、经济地位差异、福利待遇差异、消费差异、社会流动、阶层意识等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和分析，在阶层分析的维度方面远远超过了陆学艺课题组。^② 遗憾的是，这本专著仅仅局限于对中等收入阶层的分析研究，而未能扩展为对整个县域社会阶层的描述和分析。利用同样的调查资料，程丽香还提供对调查资料的分析，发表了数篇文章。程丽香的研究还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通过分析发现，发达县域的社会阶层结构为比较接近橄榄型的“锥形”而非“金字塔型”，^③ 这实际上是对陆学艺课题组第二个论断的一种否定；二是发达县域的城乡收入差异较小，但阶层内部差异悬殊。^④

就本次研究的需要看，目前的县域社会阶层研究存在六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由于缺少理论上的敏感或对实践意义的认知，目前针对县域社会的阶层研究尚处

①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01。

② 程丽香：《中等收入阶层实证研究：以福建省东南沿海县域为例》，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

③ 程丽香：《转型进程中东南沿海县域社会阶层的实证分析——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08（1）。

④ 程丽香：《东南沿海县域居民收入不平等与阶层差异——来自福清市的调查》，《东南学术》，2009（6）；程丽香：《东南沿海县域居民阶层意识比较分析——基于福建省福清市和龙海市的调查》，《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1）；程丽香：《东南沿海县域居民收入差异及内在关联》，《福建例证·改革》，2009（8）。